



汪榮祖人物書系

学人丛说

汪榮祖◎著

Biographical Studies by Young-tsu Wong

中華書局

汪荣祖人物书系

学人丛说

汪荣祖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学人丛说/汪荣祖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08. 11

(汪荣祖人物书系)

ISBN 978-7-101-04900-8

I. 学… II. 汪… III. ①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近代②名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现代 IV. 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1946 号

书 名 学人丛说

著 者 汪荣祖

丛 书 名 汪荣祖人物书系

责任编辑 高 天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630×960 毫米 1/16

印张 21¼ 插页 4 字数 236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4900-8

定 价 36.00 元

汪榮祖人物書系

學人叢說

榮祖





作者 1971 年华盛顿大学博士毕业时与萧公权(右)摄于萧宅门口



作者与钱锺书(左)1988年摄于钱先生北京三里河寓所

人物书系序

传记作品在当今的书市里，仍属大宗；通俗性的名人传记，尤其受到读者们的欢迎。学术性的传记，虽未必畅销，却在史学著作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西哲培根（Francis Bacon）认为史有三要，即时、人、事；然则，人与时、事，实鼎足而三。中华史学的主干就是纪传体，纪与传都是传记，即章学诚所谓“包举一生而为之传，史汉列传体也”^①；不过，传统中国的列传，大都失之简略，几乎没有大叙事体的详传，而又往往以儒家价值观来褒贬人物。

西方早期的传记则褒而不贬，歌颂贤君圣徒，视为上帝的模范生，作为人间的示范，如《拉丁载记》（*The Latin Chronicle*）几乎都是这类人物的传记，反映文艺复兴前西方神权统治下对所谓伟人的偶像化与理想化，与曾国藩所说：“司马氏创立纪传，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敝者，独赖有伟人焉，以经纬之，故备载圣君贤

^① 章学诚，《文史通义》（台北：国史研究社，1972），页154。

相,瑰智玮才”^①,在精神上甚是切合。文艺复兴之后,始有褒有贬,略同儒家褒贬的涵义。

直至近代西方,包斯威尔(J. Boswell)写老师约翰生(S. Johnson)的一生,巨细靡遗,皇皇长篇,写得栩栩如生,具有高度的可读性,成为名作;此传的优点主要是学生亲炙老师,得以就近观察,体会殊深,但所记晚年详而早年略,并不是一部均衡的传记,固然是旷世名作,却不能说是现代传记的典范,而包斯威尔之后久无传人,一般的传记作品,仍然意图美化伟人,使传记成为一种“遮羞艺术”(the art of concealment),意不在展露人性,实在掩盖人性,得不到其人的真面目。20世纪之初的英国,出了一个传记写作奇才斯特雷奇(Lytton Strachey),所写《维多利亚名人合传》(*Eminent Victorians*),不但不奖饰传主,而且纵嘲讽幽默之笔,暴露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虚伪性,因其文才洋溢,确立现代传记的文学性格;惟就史家的标准而言,未多求证史料,不够谨严。

史学家以历史人物为写作题材,乃顺理成章之事,因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必然是历史的重要内容;不过,历史学家除了重视历史人物之外,更要重视历史人物的时代与处境,不论时代创造了人物,还是人物创造了时代,两者之间的关系皆不可忽略。故史家立传,不仅需要文学家描述人物的文字技巧,而且还要具备了解人性、时代与社会的充分知识与分析能力;如果前者是“艺术”,则后者近乎“科学”。如何结合文笔与研究、个人与群体、时间与空间,应是史家写传的基本面。然则,史家要确切地重现

^① 曾国藩,《曾文正公文集》(同治十三年传忠书局木刻本),卷二,页23。

古人风貌,固然要写评其一生,展示其形象,分析其对时代的影响,更要信而可征,风雅可读。

我于1960年代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研究院时,曾任俄国史名家屈莱果(Donald W. Treadgold)教授的研究助理,并以俄国史为我的副科之一,所读佳著之中有不少出自史家之笔的俄国历史人物传记,屈教授的《列宁及其政敌》一书^①,即其中之一。列宁为俄国新兴“知识阶层”(Intelligentsia)^②之一员,而知识阶层的兴起,则由于帝俄农村经济之破产,民不聊生,知识阶层为民请命而专制政府不予垂听,遂驱使关切民瘼的知识之士走向暴力革命,各为俄国的前途拼搏,列宁即其中之一人,并于1898年乘群众政治运动兴起之际,逐鹿问鼎。马克思主义革命风潮之所以得势,固有其系统哲学为之鼓动,然屈师尤注意逐鹿群雄中之自由主义派的软弱,其领导人如施波夫(Shipov)与米留可夫(Miliukov),不仅其组织松散,且乏明确之理论与目标,对当时俄国的局势又无清晰之认识。至于社会革命派(SR)的领导人切尔诺夫(Chernov),对阶级斗争并无认识,故难以建立坚固的社会阶级基础,虽注意到农村问题,但又无正确的农村计划,采暗杀手段,亦非长久之计。相比之下,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(The Bolsheviks)于1905年已有赢得政权的方案,知道群众之所好,并打入其中,直至大势既定,掌握权力之后,方显其真正之政治意图。屈师的结论是,列宁早于1906年实已胜券在

^① Donald W. Treadgold, *Lenin and His Rivals: The Struggle for Russia's Future, 1898 - 1906* (New York, 1955).

^② 所谓知识阶层,乃由非同一社会经济出身而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之男女所组成;他们不论经何种渠道获致知识,莫不关怀其所处之社会问题。

握,克伦斯基(Alexander Kerensky)虽然赢得二月革命的胜利,并无稳定政权的实力。列宁在历史上的重要性,莫过于在俄国建立红色政权;作者将传主及其对手比而观之,从中得悉列宁的成功,不仅仅由于其人之强,亦由于其竞争对手之弱,借传观史之视野,顿为之开阔,对我甚有启发。

当时阅读所及,至今仍有印象的还有马克麻士特所著《俄国极权哲学家戴尼列夫斯基传》^①。此传亦以人物来衬托历史,作者力言历史乃人所创,而人受时代环境之影响。戴尼列夫斯基所处之时代,西潮正冲击俄罗斯,外来思想为当地制造了不少心理上与文化上的难题;作者以为戴氏之极权思想固然有其历史渊源,亦具时代使命,极权实为解决时代难题的一种方法,下开中央极权政治之先河。此传借一位极权思想家戴尼列夫斯基,展开自帝俄到俄帝在思想上的承袭关系,而此人正是此承袭关系中的重要关键,不仅突显了传主在历史上的重要性,而且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,也对我甚有启发。

英美学术界人士研究中国历史也往往从传记入手,就近现代学术思想人物而言,如《近代中国与新世纪:康有为思想研究》^②、《追寻富国强兵:严复与西方》^③、《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

① Robert E. McMaster, *Danilevsky: A Russian Totalitarian Philosopher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

② K. C. Hsiao, *A Modern China and a New World: Kang Yu-wei, Reformer and Utopian, 1858 - 1927* (Seattle & London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74).

③ Benjamin Schwartz, *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: Yen Fu and the West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4).

转变》^①、《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源流》^②、《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》^③、《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》^④等等，我自己也曾写了一本《追寻现代民族主义：章炳麟与革命中国》^⑤，都是以重要人物为中心来展示学术思想的历史面貌。在华人世界里，自“五四”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，突破传统纪传的格局，以白话书写西洋式的详传或大传，犹如雨后春笋。

我于1978年首次回到台湾任教一年，因出版社的鼓励，开始有计划地用中文写作，其中有关传记的计有《史家陈寅恪传》、《康章合论》、《走向世界的挫折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、《章太炎研究》、《康有为》、《蒋介石评传》（与李敖合著）。去年秋天在北京，承中华书局提议出版我的传记作品系列，我欣然接受；我先将相关论文编成一集，曰《学人丛说》，权充系列的第一卷，其他各卷陆续付梓。我尚有写几部传记书稿的计划，我的《史家陈寅恪传》只写其一生，而其身后热闹非凡，议论亦多，应补写一本《陈寅恪身后叙》。钱锺书的文史哲学，令人倾倒，我有幸成为他的忘年交，屡允侍谈，屡蒙赐函，甚觉亲炙其人，再

① Hao Chang, *Liang Ch'i - ch'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, 1890 - 1907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1).

② Maurice Meisner, *Li Ta-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67).

③ Laurence A. Schneider, *Ku Chieh - kang and China's New History: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71).

④ Jerome B. Grieder, *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: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, 1917 - 1937*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0).

⑤ Young - tsu Wong,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, 1869 - 1936* (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).

读其人之书,别有领悟的喜乐,很想写一本《槐聚学记》,以志此机缘。我在研究章太炎时,觉得他的文化观点颇似柏林(Sir I. Berlin)所说的“文化多元论”(cultural pluralism),而此一文化观点也可见之于西潮冲击下的俄国与日本,受西潮冲击的中国自不能例外;太炎虽在中国首发此义,并非独一无二,我甚愿写一本《民国六学士——中国现代文化多元论者》,以便详加发挥。中华书局已经预约这三本尚未动笔的稿子,我也在此预告,即洋人所谓“预(雨)支票”(rain check)也,同时给自己必须要完成书稿的压力。

近年来,中国大陆出版业兴隆,书市蓬勃,使我在台湾出版过的一些旧书,能够在大陆获得新生命,而且市场大、流传广,远非岛内可比。任何作者必定以读者多为荣,而我更感高兴的是,著名的中华书局愿意出我的书。中华书局牌子老、底子硬,出了许多学术名著,包括钱锺书先生的《管锥编》在内,我的书侧身其间,与有荣焉!

汪荣祖

2006年7月27日于美东马州之帝乡

自叙

我曾在台湾出版过好几本有关人物的传记^①，今后还有计划写几本^②。近蒙卓有学术声誉的北京中华书局邀约，将我所写有关人物的专书编印成“人物系列”在大陆陆续出版，我当然欣然同意，并感荣幸。中华书局的建议使我想起，多年来我也写过不少有关人物的论文，足以编成一书，经整理后选出十二篇有关论述学人的文章，因而额之曰《学人丛说》，为系列的第一册，并将本册简介如下：

此册各文涉及十四位学人，然而并不是十四篇传记，而是论述与这十四位学人相关的一些议题，甚至是有争议性的议题。

① 先后出版《史家陈寅恪传》（香港：波文书局，1976；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4，1997；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）；《走向世界的挫折——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（台北：东大图书公司，1993）；《康有为》，世界哲学家丛书（台北：东大图书公司，1998）；《章太炎研究》（台北：李敖出版社，1991）；《康章合论》（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8）；《蒋介石评传》（台北：商周出版社，1984；北京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，1995），上下册，与李敖合著。

② 计划写《陈寅恪身后叙》、《槐聚学记》、《民国六学士》等书稿。

明清之际的钱谦益(牧斋)因降清而有争议,但大家都认可他学问好;不过,一般多视他为卓越的诗人与文豪。《钱牧斋的史笔》一文则肯定他在史学上的造诣,他在中国史学史里应有一席之地。但也必须指出的是,牧斋的史学并未逾越经史与经世传统,并以效法司马迁、班固自许。牧斋撰《国初群雄事略》则提供了历史书写的一个样本,其方法体例亦不出传统范畴,然其考证之精详,确定人、时、地之用心,实开乾嘉考据学的先河,似亦影响到善于以诗证史的陈寅恪。

如果说牧斋仍然是传统史家,现代中外学者几乎同声肯定章学诚(实斋)是一位能够突破传统的了不起史家。他们认为章氏“六经皆史”说不仅以史抗经,挑战当时的主流思想,而且比现代西方大师,甚至开创了传统中国唯一的“历史哲学”。《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》一文所谓“再议”者,即不同意对于实斋迹近夸张的评价,并进而论证实斋未尝超越其时代,所谓超时代之见,乃后人的“发明”而非“发现”^①。

严复于晚清留学英国,虽习海军,但其主要贡献在于介绍西学。笔者于当年阅读郭嵩焘日记时,发现郭与严之间不寻常的忘年之交,后又经钱锺书先生提醒严复与曾纪泽之间的微妙关系,并牵涉到郭嵩焘。当北大汤一介教授征稿于予,即以此三人连环叙应,或于严氏早年思想与感情尚有参考价值。严复毕生之成就莫大于翻译,而其翻译并非一般,而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有不可磨灭的影响。严译古雅可诵,虽为当时士大夫所欣赏,但后人却以译文难读,质疑其有亏信达,甚而严氏将其译者之见掺

^① 此文尚有英文版“Discovery or Invention: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Zhang Xuecheng,” *Historiography East & West*, Vol. 1, No. 2 (2003), pp. 178-205.

和原文,以及有意或无意地误译或漏译。《重读严复的翻译》一文,即针对诸多质疑重加考量,认为中英文之间原有不可逾越的语意鸿沟,直译无异死译,唯意译才能达义。严译明言意译,然因其讲究古文笔法,难度极高,自不可能将原意点滴不漏转化为译文,为了尽力达义,不免在文字上有所增减,然大致而言,已颇能意译达义。所谓借题发挥之译文,实系严氏按语,不能于译文混为一谈。至于近人所指,严氏若干误译之例,实多系未经细察而误以为误。严译诚已不可效法,但其历史意义亦不可抹杀。今日白话译文多取直译,貌似信达,实在走漏更多原意,严译似乎仍有借镜的价值。

萧公权撰《康有为思想研究》巨著中英文版先后于1975与1988年问世之后,已足为康氏盖棺论定;然近人也有些不同看法,甚至质疑康氏的变法思想及其在戊戌变法期间之角色。我为此曾撰小书《康有为》以及英文长文表达个人的意见^①。《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》一文继续提出与时贤不同之见,曾发表于《历史研究》^②期刊上。

无论在政治诉求上、文化信念上以及世界观与康有为截然不同趣的章炳麟(太炎),发展了令人瞩目的“文化多元论”,但并不意外,从比较思想史观之,受到西方思潮冲击的俄罗斯与日本皆有类似的文化多元论思维。我曾在英文论著《追寻现代民族

^① Young - tsu Wong, "Revisionism Reconsidered: Kang Youwei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," *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Vol. 51, No. 3 (Aug. 1992): 513 - 544.

^② 汪荣祖,《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》,《历史研究》,1999年2期,页72 - 87。

主义:章炳麟与革命中国》^①与《章太炎研究》(大陆版易名为《章太炎散论》)之中,对此已有所论述,并首发其义,然于《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》一文中,始有系统而详尽地发挥章氏文化多元论之义。

我早年曾写过《梁启超新史学试论》^②一文,虽已铺陈其史学之大概,未及深探其史学思想之演进。《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》即针对近年来不少学者认为梁氏“欧游心影”转变其思想而写,梁氏固然于欧游归来后潜心于学术,尤致力于史学方法之撰述,与其早年所撰《新史学》相比,自有显著的发展,然所谓后期与前期绝非截然不同的两期,前后实有所承袭。梁启超平生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主要贡献,不外介绍西方史学概念与方法到中国,以及利用外来概念与方法研治国史。

康有为演大同之旨,思维倾向一元;章太炎阐释齐物,发文化多元之论,相映成趣。康、章之外,另一对相映成趣的人物则是胡适与陈寅恪。胡、陈有交往,然两氏的文化观既异,对史学的看法也不尽相同。胡适讲求科学方法,并以展示方法为治史之目的,而陈寅恪以方法为用,意在探明历史的来龙去脉。胡、陈虽同属自由主义派,然政见未必尽同,而个性与命运更不一样。《胡适与陈寅恪》一文主要在比观同时代这两位不同类型的学人。

胡适与吴宓在学术思想上有若冰炭,胡似开放,而吴迹近保守,但在婚姻与爱情上,吴甚开放,而胡颇保守。然而胡之保守,

^① Young - tsu Wong,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*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).

^② 见汪荣祖,《梁启超新史学试论》,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,2期(1971年6月),页227-236。

并非如蒋介石所赞美的“旧道德的典范”；由于胡适身后新资料的出现，世人才知道，胡适生前有多次婚外情，特别是与曹诚英之恋，爱得要死要活，但胡适“爱惜羽毛”的个性，使他在压力下“不敢爱”。相比之下，吴宓敢爱得多，但他爱情的理想远离现实，到达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。《胡适、吴宓和爱情——兼论私情与公论》即以胡、吴两氏的实际爱情经验来讨论爱情观，以及私情与公论的议题。

萧公权先生是我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究院念书时的老师，他原是清华园名师，因时局变化而万里寄踪于国外，晚年著作几均以英文撰写，国内较为年轻一代的学者，愈来愈少人知道这位学贯中西、闻名国际的大学者。萧先生的专长是政治思想，《政治多元论》^①一书是他早年成名之作。回国后在清华等校讲授中、西政治思想史，并于抗战期间完成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巨著。《萧公权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建构》一文指出，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原无中国政治思想，而萧著之前的一些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并不符合严格的学术规范。所以萧先生不啻凭其深邃的学力，建构了一部合乎国际水准的中国政治思想史。

《钱锺书论史学之体用》为槐聚说史阐述五篇^②之一，乃我阐述钱先生解史的作品。钱锺书是文学评论家、小说家、诗人，然他对史学也颇有史家未及见的慧识，值得治史者借鉴。我有幸认识钱先生，知其人读其书似我更能会心，很想写一本《槐聚

① Kung-chuan Hsiao, *Political Pluralism: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* (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, Philosophy, and Scientific Method, London and New York, 1927).

② 收入汪荣祖，《史学九章》（台北：麦田出版社，2002；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6）。